



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

——陈思和评传

顾艳 / 著

陈思和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上海。成长、求学、工作，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度过。他外表生活秩序井然、千篇一律，然而，内心生活、精神生活却迥然不同。他的思想在每个时期，都会自我改造，以创新的姿态走在学术前沿。他曾这么介绍过自己：“读书教书，故经历平平；甘守蜗居，亦无险可冒。唯有一颗不安定的心，时时飘荡在精神的海洋和他乡处。”

让苦难变成海 森林

——陈思和评传

○ 顾艳 /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顾艳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430—4081—6

I . 让… II . 顾… III . 陈思和—评传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130 号

著 者:顾 艳

责任编辑:雷方家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湖北通山金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980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350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阙《关雎》，是中华诗歌的源头。诗，使灰暗变得多彩，使短暂变得永久，使有限成为无限，使生命中许多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因此，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诗的种子。从诗出发，有的成为诗人，有的成为哲学家、医生、学者、音乐家、法官等，但这里我谈的是学者。学者一生的标志是学术建树，以及在学术追求中尽可能地产生自己的理论体系与思想。就陈思和而言，进入高校开始学术生涯已近30年。岁月流逝了，他的心却依然年轻。

陈思和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上海。成长、求学、工作，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度过。上海是他的根，亦是他的家园。然而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男人，他的秉性却不像一般人们印象中的上海人。他外表生活秩序井然、千篇一律，读书、教书、写书，显得单调、刻板。然而，他的内心生活，精神生活，却迥然不同。1987年，他在《中国新文学整体现观》初版的作者简介里这么介绍自己：“我，1954年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但不会说广东话。祖父当过海员而死于海，父亲曾支内而死于异乡，我是他们的不肖子孙。读书教书，故经历平平；甘守蜗居，亦无险可冒。唯有一颗不安定的心，时时飘荡在精神的海洋和他乡处。”

1986年，陈思和与李辉合著出版第一部著作《巴金论稿》。他们的导师贾植芳先生作序，序中说：“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一反我们过去多年来成为文学研究工作的定式的孤立静止地研究作家作品；用程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方法来代替对复杂的文学现象作深入的思想剖析和美学评价的老例。他们首



■ 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

CHENSIHE PINGZHUAN

Qianyan

前言

先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兼及世界的政治社会思潮和文学现象，来观察巴金思想和艺术上的表现；从巴金创作的思想与艺术实际来分析评价巴金思想艺术特色的形成过程和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成就与贡献；不仅注意到从巴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研究巴金的思想和艺术，而且注意观察形成作家思想艺术特色的主观因素。”导师的话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鼓励。这使年轻的学子，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1987年，陈思和出版了第一部文学史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是一部纯理论著作，每一章节都有着从“五四”到“新时期”的历史环节。它们不是局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而是贯穿整个新文学史的现象。这对当时不少学者追随五花八门西方热门理论体系的背景而言，是一种站在中国立场上的有力言说。其出发点与生命内核，都为后来属于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打下了扎实基础。他在后记中说：“我想到了史的批评——不是史的研究，而是一种批评的方法。这种史的批评把我引向一个课题。因为‘五四’迄今的新文学是一个整体，对它作史的批评也只能以整体的观照。”

在陈思和的很多学术著作中，哲学的根基非常浓厚。无论他研究的现当代文学，抑或是中西比较文学；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使其阐释的作品深刻而见解独特。他的思想在每一个时期，都会自我改



前言

造，以创新的姿态走在学术前沿。这就使他虽然人到中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因此，阅读陈思和的学术著作，对于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把最好开启的钥匙。他将教会你如何鉴赏、审美，如何独立地进行思辨与思考。

陈思和温和沉稳中略带激越的学说，很有人情味。如果说埃利亚的智者第一次把哲学从天上降到了人间，抛开宇宙而来研究人；那么，人的问题，对于陈思和来说也是一个首要的问题。通过文本中的人物，在思考存在和意识的同时，其阐释人性、精神性方面有着深邃的穿透力。

陈思和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他对事业、对自己很有信心，应该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本性并不孤僻，喜欢与人交往，但不喜欢交际，也不喜欢集体性场合——人总是矛盾着的。当他在人群中淹没了自己的内心空间时，他向往着躲避到清静的黑水斋书屋里去。读书、思考、写作、实践就是他最大的兴趣。尽管他后来担任一些领导工作，但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书与教学有关的事业中。对于他来说，生活就意味着工作。他没有别的什么嗜好，工作就是唯一的乐趣，能够废寝忘食。

从出生后不到20个月起，他的父亲，按当时的说法“支援西北新兴城市建设”，远赴西安工作去了。自此，谁也不知道这个从小生长在“女儿国”里的男孩子，长大后会有什么出息。慈祥的母亲，对儿子疼爱有加，从没有对他发出一声责备的声音。童年的生活在是苦涩的。母亲每月都愁家里的开销。14岁的他不得不担当家庭“主管”，拿着母亲给他的有



■ 让苦难变成海与森林——陈思和评传

CHENSIHE PINGZHUAN

Qianyan

前言

限的钱，负责全家生活。小小少年全凭自己的坚韧毅力走过来，直至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陈思和给自己规定了一套严格的作息制度。每天清晨五点即起床，以致有次外出开会，同寝室的人取笑说：“怎么来了位退休老伯伯？”但陈思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大半辈子，并且取得了异常的效果。陈思和造就了他本人，他追求真理，渴望创新。无论学术领域的探索，抑或是教学和主编刊物方面，他都身体力行，从不自满自足。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劳作，使他能够在精神世界不断发展，永远探索。

陈思和的著作是广博而多维的。他的丰厚的理念，读者要条理清晰地理解清楚不容易。然而一旦理清他的思路，弄懂他的思想，你就会快乐无比。尤其他的理论，不是那种平地开花式的兜圈圈，而是有着一层一层的逻辑递进关系。你读之不会觉得索然无味，空洞贫乏，而会感到一种“新”的萌动着的东西，仿佛破土而出。

为陈思和写评传，是一件冒险而又责任重大的事情。幸好我们是同时代人，目睹了社会变革中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场景。我并不奢望对陈思和的理论体系做出面面俱到的考察和一无遗漏的探讨。我将着重在阐释他的思想和精神历程方面做些努力，摒除按部就班的生活罗列，力图谈些主要东西，并尽可能地谈得充分一些。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启 蒙.....	1
第二章 转 折.....	13
第三章 探 索.....	27
第四章 人 格	41
第五章 风 骨.....	57
第六章 飞 跃.....	75
第七章 教 育.....	91
第八章 学 术.....	107
第九章 批 评(上).....	123
第十章 批 评(中).....	145
第十一章 批 评(下).....	161
第十二章 视 界.....	179
第十三章 实 践.....	193
第十四章 书 架.....	209
结 语.....	223

Qimeng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

第一章 启蒙





陈思和 1954 年 1 月出生于上海。这时新中国成立不足五周年，朝鲜战争也刚刚结束不久。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53 年秋，陈思和还在妈妈肚子里畅游时，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会议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因此，那些年毕加索画的和平鸽满天飞。和平鸽成了那个时代的吉祥物。父亲当时给陈思和取名为：陈坚刚。但去派出所申报名字时，抬头看见派出所申报户口柜台上写着值班户籍警的名字：姚思和。父亲猛然想起媒体上很热闹地在宣传和平理事会，就换了陈思和这个名字。

1954 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上海开始有计划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些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正面临着“公私合营”的状态；而这些大名鼎鼎的私营公司就坐落在金华街上。金华街一排旧式住房的某一间，便是陈思和的出生地。这条街全长不足 500 步，宽不足 15 步；一端连着南京路，一端连着九江路；顶头就是大舞台戏院。那时南京路上的有轨电车还未拆去，白天晚上都在叮叮当当的嘈杂声音中度过。这个未来学者的理论学说，仿佛在襁褓里就与这个城市的“大舞台”紧密相连。你从弥漫在这个城市的空气里，似乎能呼吸到生机勃勃的创造气息。

苏州河，从前叫做吴淞河。自古以来就是上海的母亲河。它在江南土地上蜿蜒流淌，虽比不过德国的莱茵河，英国的泰晤士河；但它沿岸风格迥异的百年建筑，显现出沧桑；令你的思绪回溯到 20 世纪初，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和兵荒马乱的上海滩。战争总是格外地残酷。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出兵 10 万，飞机 100 架，军舰 60 多艘，淞沪抗战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局部抗战阶段的一次重要战役，也是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日寇肉搏的一场斗争。

淞沪抗战前，陈思和的外祖父还是一位英俊青年。他在英商电车公司里当查票员，能操英语。当时，卖票员揩点外国人的油是公开的秘密。所以查票的工作很容易被视为“洋奴”，受到世人的鄙视。不过，外

祖父当时的经济颇丰，日子过得很滋润。闲下来时，他会去苏州河桥上看风景；看天上的云彩落到河里，水波漾动他斑斓的梦幻。那梦幻仿佛是桥洞里穿过去的一条条木船，载着他摇到“远方”。那一年新婚时，他在麦根路订了一栋洋楼，还买了全套的红木家具。这对他来说，俨然像个“上等人”了。男人的“面子”与“骄傲”，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满足，外祖父喜形于色。然而好景不长，原因是闸北在 20 年代属于上海的中国地界，而麦根路所属区域正是中国地界范围之内。

闸北曾经繁荣一时，但淞沪战争爆发时，日本飞机不敢炸租界，却把中国地界闸北炸成了废墟。从此，闸北成了上海的贫民窟。后来，各路逃难来的难民聚集在这里；“棚户区”和“滚地龙”的概念，就连在了一起。闸北在上海人的心目中，便是“难民营”的感觉了。然而外祖父那时光凭着他的敏感，想在战争没来之前，在租界物色房子。如果外祖父一意孤行，说干就干，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损失。可是男人总是迁就自己的女人。外祖母在关键时刻爱好虚荣，她非要等杭州的妹妹来上海看看她的好房子和红木家具。于是一拖再拖，直拖到战争突然爆发，全家人仓惶逃到租界。外祖父手上只带了一卷草席和一只热水瓶。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创建起来的家园和财产，在战火中风烟滚滚地化为灰烬。他心如刀割。沦陷期间，外祖父一蹶不振。但他很自觉地不参与任何与日本人有关的职业，结果等着他的是在贫困与失业中熬日子。

外祖父自学成材，旧学底子相当不错。他要让思和这个外孙在体力和道德上都得到健康发展。于是，他想方设法来唤起这个外孙的求知欲和想像力。譬如：他哄外孙吃饭，就把收集了一套的《水浒》人物的旧香烟盒纸，一张张贴在窗下的墙壁上；每天喂饭时便指着墙上的人物讲故事。外祖父说到高兴处，就会用调羹盛着饭菜，一边往外孙嘴里送，一边高声大叫：“快看！黑旋风李逵来了！阿呜！”就这样，这小孩三岁就成了《水浒》专家，他把 108 将连同绰号姓名背得滚瓜烂熟，成了外祖父向客人炫耀的一大乐事。直至今日，陈思和还很感慨地说：“我外祖



父很有才学，他后半生几乎一直闲居着，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除了负责我的启蒙教育外，他曾打算编一部讲汉字改成拼音字母的词典。‘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惊慌地烧掉许多老式账簿；里面记的都不是账目，而是文字改革的方案。春天里，他经常穿一件长衫，拉着我在外面到处逛。用他的说法是‘兜圈子’，漫无目标地在太阳下乱走；使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认识了大自然孕育着的各种可爱的生命。”

那些年，外祖父与外祖母住在闸北高寿里。上海的石库门房子，自1870年以来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历史变迁。那种“三上三下”结构的老式石库门，住房多，格局就格外气派；颇适合大家庭居住。但淞沪战争以后，逃难人数剧增，房子被分割，空地被搭建；这时的石库门整个就是典型的“七十二家房客”型的住宅了。以致很多年后，母亲说起高寿里的石库门房子，总是大发感慨：“一家五口同居一室，条件实在太差了。”

相对而言，陈思和生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5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被一种理想主义和报效国家的激情振奋着，自觉地响应政府的各种建设性号召。陈思和的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儿子刚刚会走路时，便响应上海市政府“支援内地建设”的号召，去了西安工作。这时候他已经41岁，却仍然像青年人一样热血沸腾。胸戴大红花，抛妻别子坐上西去的列车，心里感到一份无上的光荣。陈思和的母亲，当年是某个单位的电话总机接线员。陈思和在家里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母亲让住在闸北老火车站附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早出晚归来家里帮忙，照顾年幼的孩子。

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长子代父挑起家庭的重担是天经地义的事。小小年纪的陈思和要担当家庭主管，要负责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与三顿饭菜和房租水电费等日常开销。有一次因为没钱，他只能买6分钱一只的酱麻雀，走在路上想告诉妹妹权当是酱鸭时，有一份欣喜更有一份苦涩之情。1966年“文革”开始时，陈思和小学毕业。但他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很贪玩，成绩并不好。有一个冬天的早晨，外祖父

把他从热被窝里拖出来，拖到附近一家菜场；外祖父对着正在用锤子敲结冰的鱼的一群人说：“你看吧，再不好好读书，就与他们一起敲鱼去！”外祖父当然是看不上敲鱼的，但是冰天雪地的冷对于小孩来说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陈思和小小的脑瓜里，还没有特别的意识。那一年，他们的家搬到了杨浦区凤凰村。这是一个小单元，两间并立的房间，右面是厨房，左面是卫生间，显得很有派头。

这男孩当年对“文革”的恐惧，既是外祖父传染给他的，也有他亲眼目睹的现实场景。比如：抄家、批斗会、戴着白纸做的高帽挂牌游街等。外祖父博古通今，谙熟历朝掌故，现实处世极为谨慎。陈思和自小耳濡目染，长大后自然知道为人处世是一门学问。然而外祖父的身体每况愈下，到1971年林彪逃亡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沙漠时，外祖父已经患上了老年性精神分裂症。他对社会充满恐惧，几乎足不出户；还把家里的图书、照片以及自己多年辛苦写下的关于文字改革的手稿全部撕碎，宛如地洞里惊恐万状的老鼠。

外祖父的形象，深深地烙进陈思和的心里。陈思和后来发奋读书，与外祖父一生的经历和外祖父对他的启蒙有关。这位老人虽然没有明确希望外孙长大做什么，但在潜移默化中已证明了他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正因如此，陈思和在十三四岁读巴金的《憩园》时，才能被寒儿为寻父爱的情节所震撼；才能深深同情被妻子和大儿子赶出家门的杨梦痴，在夕阳下慢慢移动的瘦长褴褛的影子。20世纪60年代末，陈思和在杨浦区的一个中学里读了两年初中就毕业了。当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母亲旗帜鲜明地要儿子留在上海，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去了西安支内。她的法宝是与人交换房子，远远地搬到淮海路上的“飞龙大楼”，逃避学校当局派人来“动员”上山下乡。这一招果然很灵，新的街道不知道她儿子的具体情况，就不来“动员”了。

母亲是深爱着自己的儿子的。若干年后长大成人了的儿子还回忆说：“我每天晚上一觉睡过后，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总听见缝纫机的声响。母亲白天上班，晚上操劳家务，知道我们都睡下了，她才拉开缝纫

机，帮我们缝缝补补。我常忍不住说：‘妈，你还没有睡呀！’母亲看到我们醒了，就停下机器，走过来为我们拉拉被子，或检查一下墙上有没有蚊子。最后，她伸出手，用手心放在我们的额上拭一拭，就关灯去睡了。这已经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她总要用手心拭一下我们的脑门才睡。我也一直没有问她，这样做是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出汗，还是怕我们半夜里无缘无故地发烧（我小时候体质很弱，经常生病），不过母亲的手心也像有魔力似的，在额头上放一放，我才睡得着，睡得香。”



初中毕业后，陈思和在社会上晃荡了六年，这六年他丝毫没有浪费时间。读书求知，正是他这六年中拼命努力做的事。然而，那时很多图书被打入冷宫，学习文化知识并不那么自由。不过，有两种文艺类书是可以堂而皇之阅读的。一种是鲁迅的书，一种是毛泽东古体诗词。鲁迅的书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与骨气，而毛泽东的诗词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宏伟诗篇，既是驰骋疆场的战地之歌，更有真实感情的流露。“豪放”和“婉约”，兼而有之。

陈思和正是因为早年喜爱鲁迅文章和毛泽东的诗词，才有了后来看问题的深邃、沉着和不拘一格。并且，能够坚定不移地走他自己的学术道路。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28日《上海公报》诞生，中美由此逐渐建立了正常关系。当时正好18岁的陈思和身穿一身卡其布蓝色中山装，那天，他出于好奇，想上街去看看这位美国总统和他们路经的车辆。然而，那天街上一片肃杀之气。平时人来车往熙熙攘攘的淮海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只有神态古怪的便衣，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青年人。

不久，一个机会让陈思和走上了工作岗位。他把编制挂在了某个街道图书馆，自己在卢湾区图书馆参与书评工作。当时街道图书馆属于小集体所有制，卢湾区图书馆属于公有制单位。由于体制的不同，后来卢湾区图书馆想调他过去，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调成。那时的户籍、所有制关系等人事制度，都是很僵硬的东西。个人想改变所有制，

就是参军当兵也不行,如果你是农村入伍的兵,复员了还得回农村。上大学也不行。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也是哪里来哪里去。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改变了这种僵化的制度。陈思和那时候为“所有制”而悲哀绝望。他当时最高的理想,就是成为卢湾区图书馆里的一名正式职工。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仍能用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整日坐在卢湾区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一些当时政策允许开放的图书和报刊。

时光静静地流淌着,满脑子充满幻想又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陈思和,面对书本却能如饥似渴。他像海绵一样,不断地从书本中吸取营养。身心虽安宁,灵魂却是骚动不安的。书的世界,潜藏着一片海洋。在海里遨游,需要功力和实力。陈思和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而卢湾区图书馆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那些老知识分子因为各种运动中的问题,而被闲置于此,大家一起编辑一本《图书馆工作》的油印刊物。这本刊物,专门刊登书评。按当时的水准,这本刊物的装帧相当考究,内容也不俗。刊物背后有一个书评组,由爱好文学的青年组成,全称为卢湾区工人业余书评组。

有了志同道合者,陈思和便觉得不孤单了。图书馆政宣组一位姓董的负责人,曾在海南岛当雷达兵。他话不多,精力旺盛,很有组织能力。为了提高书评组的写作能力,他特地把“文革”前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分章节拆开影印,分给大家学习。这是陈思和最早接触的文学原理,也为他日后的学术之路打下了一些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工作,陈思和是快乐的。他不仅在学习和写作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在董耀根的影响下,还渐渐培养起自己的编辑与组织工作能力。

卢湾区图书馆明复楼的窗户很多,坐在阅览室一方静谧的天光下,陈思和的思维越来越活跃。这里有源于书本的知识,还有几次举行的文学讲座,使他忽然明白了许多东西。他的血液涌动着,一种想干些什么的力量驱使着他。那些天,他读了郭沫若1971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很有感触,便开始撰写题为《与郭沫若商榷〈李白



与杜甫》》一文。“文革”期间,《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最主要的学术著作。这部学术著作的出版,在一片荒芜的国内学术领域引起轰动是可以想像的。可是郭沫若在这部著作中扬李抑杜,对杜甫作了苛刻的批评。陈思和虽然没有丰厚的古代文学知识,也没有研究过唐代诗歌,但凭着一种朦胧的学术感觉,觉得这样论述古代诗人是不公正的。于是洋洋洒洒写了长篇大论,寄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没有想过会惹什么灾祸。当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原稿转到陈思和所在街道派出所后,派出所一位姓何的所长连忙来家访;发现作者只是一个孩子,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一波平息之后,陈思和仿佛懂事了不少,也感到了现实生活里存在的危险。转眼到了1974年,这年的整个上半年,全中国都在搞“批林批孔”运动;紧接着是评法批儒,研究法家,捏造出一个儒法斗争的文学史模式。当时,书评组的成员也卷了进去。卢湾区图书馆的两位研究古代文学的馆员,接受了一个任务,要编写一本《刘禹锡评传》的小册子。陈思和正好跟着这两位“师傅”,学习古典文学。他尤其喜欢读起来朗朗上口的古典诗词:“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他把刘禹锡的竹枝词背得滚瓜烂熟。后来他进入大学深造,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刘禹锡的竹枝词。

1976年1月,陈思和22周岁了。他内心的希望与焦虑,也一天天滋生起来。但这是特殊的一年,在陈思和的个人历史中有着深刻的印象。那一年春天,他随街道一批青年人下乡劳动。那时他担任了街道的团委委员,成了带队下乡的“头”。20年前,他父亲也是带队的“头”,动员人们响应国家号召,把一家大饭店搬到西安去落户。20年后的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浪漫和热血的气质。但是两个月后,陈思和在农村患了乙型肝炎,住在医院隔离病房里,情绪低落。他想着自己的命运,想着自己只是区图书馆里的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小青年,一